

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安全理论及其批判

刘 胜 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0)

[作者简介] 刘胜湘(1962-), 男, 湖北孝感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安全、国际关系理论、外交政策研究。

[摘 要] 20 世纪 40 年代末, 现实主义思想成为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主导理论。20 世纪 70 年代末, 新现实主义思想使战后现实主义理论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同时也引发了 80 年代至今 20 余年的国际安全思想大辩论。具体来看, 西方现实主义安全思想包括获取权力均势的均势安全论、建立霸权体系的霸权安全论及谋取地缘优势的地缘安全论。

[关键词] 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安全理论; 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6)02-0209-07

一、西方现实主义安全研究的历史演进

现实主义理论一直在西方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占据主导性地位, 是安全研究中最为广泛的分析视角^[1] (第 25 页)。西方具有现实主义传统。修昔底德的“战争论”、马基雅维利的“国家利益论”和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等是西方现实主义的主要思想渊源。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出现了“海权论”、“陆权论”等军事战略思想。从根本上看, “海权论”和“陆权论”实际上是战略研究。战略研究是一种特殊意义的安全研究。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科恩的“地缘区域论”和布热津斯基的“棋盘论”就是这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以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的国际安全研究开始主导国际政治研究领域。20 世纪 20 年代末,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使理想主义陷入困境, 这促使现实主义思想在西方国际安全研究中再次兴起, 以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者对理想主义安全观进行了批判。1939 年出版的《二十年危机——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及 1948 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使现实主义在与理想主义的争论中占据优势, 并一举成为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主导理论, 从此, 安全研究作为一个学科从国际政治研究中分离出来, 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 出现了安全研究的黄金时代^[2] (第 117-141 页)^[3] (第 211-239 页)。20 世纪 70 年代初, 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了人口、资源、生态、发展等关系到人类生存的问题, 人们日益认识到国际安全与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关系等问题的重要性, 安全概念面临扩展和重新界定的问题。一些自由派和批判理论学者开始对传统现实主义命题进行反思, 他们提出国家安全的概念应该扩展到包括经济发展、环境生态、恐怖主义、全球性流行疾病等非军事领域。与此同时, 他们对现实主义的安全思想进行了理论上的批判。在批判理论和自由派学者的夹击下, 现实主义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1979 年, 发展了经典现实主义的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代表作《国际政治理论》问世, 使战后现实主义理论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绕开了经典现实主义中人性等难科学界定的假设, 把

国际安全关系研究集中在体系结构层面。结构现实主义的出现引发了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20 余年的西方国际安全思想大辩论。沃尔兹使战后现实主义理论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使现实主义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继续占据上风。1981 年,罗伯特·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进一步论证了霸权安全论,该理论加强了现实主义理论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优势。新现实主义对安全的重视使其被誉为最重视安全研究的学派。由于冷战的结束,安全研究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开始风光起来^[4](第 5 页)。

现实主义理论从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像人一样也有追求权力的本性,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国家间权力斗争成为国际社会的本质。国家在国际上总想谋求权力,只有国家间形成权力均势或在国际上建立霸权体系才有可能使国际社会处于安全状态。西方现实主义安全思想据此强调通过加强军事力量、结盟等方式达到均势状态或建立霸权,或占据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获得国家的安全目标。这也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现实主义安全研究的三个主要分支,即获取权力均势的均势安全论、建立霸权体系的霸权安全论和谋取地缘优势的地缘安全论。

二、均势安全论

现实主义的均势安全思想基于对人性的分析。其逻辑是,人具有权欲本性,国家像人一样也具有权欲。由于国际社会国家权欲困境普遍性存在,其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权力均势维护国际安全。摩根索指出,政治现实主义建立在对人性多元的理解上,认识到人性具有不同的侧面,如“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宗教人”等。但人们必须从某一个侧面认识国际政治面目,即从国际政治的固有本质理解国际政治^[5](第 14-15 页)。这一固有本质其实就是国家类似于人的权欲本性。摩根索认为,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5](第 27 页)。像所有政治一样,国际政治必然是权力之争^[5](第 27 页)。用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道路的主要路标^[5](第 5 页)。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对理想主义的安全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并强调了权力的重要性。他指出,理想主义注重观念、原则,忽视现实,忽视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因素和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这是该理论的致命弱点。卡尔认为,道德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是整个国际研究领域最模糊、最困难的问题^[6](第 146 页)。国际政治研究者虽然还不能完全抛弃理想主义,但国际研究应该将研究者对未来的雄心和当前的现实结合起来^[6](第 147 页)。在道德、伦理标准与权力政治、价值中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上,现实主义绝不能脱离实践,忽视权力因素。新现实主义避免了难以科学界定的人性分析,主要考察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提出了国际体系的结构理论。在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中,人性是国际安全竞争的深层原因,新现实主义理论则认为安全竞争根植于无政府状态。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际体系内有两个变量,其一是结构,其二是单元。一个系统是由一种结构和相互作用着的单元组成的^[7](第 93 页)。由单元间的能力分配决定的国际体系结构对单元即民族国家的影响比单元对单元的影响会更大,体系随着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在沃尔兹看来,只要结构稳定,国际安全才能维护,这就像市场而不是某个公司对经济的影响更大一样。由于国际社会没有最高权力机构,国家处于自助状态,国家也只有通过自身努力才能获得安全。主要大国通过结盟等外部均衡(external balancing)和加强军备等内部均衡(internal balancing)等手段使各力量之间处于均衡状态,以此来制衡威胁安全的手。针对国际经济竞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日益加大、国际制度开始受到重视的现象,沃尔兹认为,国际政治是权力、斗争和和解的领域^[7](第 134 页)。国际制度仅为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反映,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有限。国家在最关键的时候注重的是安全,而不是权力。这是新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修正^[7](第 2 页)。

在国际政治的权力争夺中,如何摆脱国家争夺权力的困境维持国际社会的安全?现实主义提出的设想之一是权力均势。权力均势是传统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国际自助机制,是各国自发作用的结果。均势是各方利益暂时妥协的产物,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均势状态就会被打破,各主要力量之间会重新组合,达到新的均势。在一个仍以主权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作为动力的世界中,和平只能通过两种方法来维

持,其中之一是社会力量自我约束机制,它在国际舞台上表现为各个国家的权力斗争,即权力均衡^[5](第23页)。一些国家无论试图维持现状还是推翻现状,都表现出对权力的追求。这种权力欲势必导致所谓权力均衡的态势和旨在维护这种均衡的政策。权力均衡和维护这种均衡的政策,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也是使由主权国家构成的社会得以稳定的基本因素,国际权力均衡的稳定,不是由于该原则的错误,而是因为该原则在一个主权国家构成的社会运行时无法摆脱特定的情形^[5](第167页)。沃尔兹也认为,如果说有什么独特的、关于国际政治的政治理论的话,均势理论就是。有些人相信,均势是对各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佳保证;另一些人却认为,国家进行过的大多数战争,都是均势引起的。现实主义则相信前者。均势理论认为,不管是一些国家还是所有国家有意识在寻求建立和维持平衡状态,或者,不管是一些国家还是所有国家有意识想要征服世界,均势形成的趋势还是会出现。均势理论把国际政治描述成一个竞争性的领域。均势一旦受到破坏,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建起来^[7](第140-155页)。建立均势截断了进攻的后路^[8](第42页)。

现实主义认为两极均势是多极均势的一种特殊形式,认为两极均势同样有利于降低战争危险,甚至比多极更安全。因为两个领导者的体系比有多个领导者的体系更加易于管理,两极中谁都没有足够的武力颠覆均势,如果产生冲突将比较容易控制,在两极间比在多极间达成和执行协议更容易。在新现实主义者看来,两极体制比较稳定和安全。沃尔兹认为,自1945年以来,尽管国际情况并不符合理论家们的规定(如大国数要超过两个,有一个主要国家能扮演平衡者的角色),世界一直是稳定的,大国构成的世界相安无事^[7](第145页)。两极比多极更加稳定和安全。两极世界不但是和平的世界,也是稳定的世界^[9](第314页)。多极的世界中不安全的因素太多,从而造成世界的不稳定状态。人类进入核时代后,传统的均势思想为核均势理论所取代。核恐怖均势(nuclear balance of terror)使两极力量实现了相对的均衡。由于核武器的巨大毁伤力,每一方实际上都具有力量上的优势,这样导致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基辛格也认为,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甚或战争,但如能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则在于使一国宰制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稳定缓和,甚至和平^[10](第5页)。

三、霸权安全论

霸权安全论亦称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这个词最早是由基欧汉创造的^[11](第103页)。“霸权稳定论”的思想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在经济领域提出,后于80年代初被罗伯特·吉尔平应用于国际安全领域的。金德尔伯格认为,世界经济要想保持稳定,必须拥有一种“稳定器”,即某个国家能负责为亏本商品提供市场,让资本稳定地(不是逆循环地)流动。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11](第87-91页)。他认为,霸权体系的存在对世界经济的稳定至关重要。因为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着一一般经济生活中的公共物品,如国际货币等。每个国家都可以从中享受这些公共物品带来的好处。一般国家都不愿提供这些公共物品,霸权国有提供公共物品的意愿和能力。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英国霸权正在衰弱。英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衰落,而此时的美国却在按孤立主义方式行事,直至1936年,1941年或1945年^[12](第69页)。美国在1936年以前一直不太愿从英国手中接过这一责任。吉尔平等学者运用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理论指出,霸权是指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统治着体系中所有其他国家^[13](第29页)。他认为,霸权国体系不仅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而且有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霸权国家与国际体系稳定与安全密切相关,霸权国实力越大,世界和平与安全就越有可能。历史上出现了三种霸权体系,即“古罗马治下的和平”、“英国治下的和平”及“美国治下的和平”。霸权国家的认可是以其提供公共利益为代价的。像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一样,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保证了一种相对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体系。因为霸权国家的政策在给霸权国自己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那些期望并能够利用国际政治和经济现状的国家得到好处。因此,霸权体系下的世界是稳定和安全的。因

此,只有在霸权存在的情况下,自由经济秩序才能繁荣和充分发展。吉尔平运用成本分析法论证了霸权国家的衰弱趋势,这从反面论证了霸权安全论的正确性。吉尔平认为,根据边际收益递减原则,霸权国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与从中获取的收益成反比。随着公共物品的数量增加,霸权国维持霸权的成本将逐渐高于霸权的收益,因为领土扩张增加了财政负担。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帝国或是分裂,或是被迫减少其领土控制和财政负担。如果帝国不能成功地收缩,从而达到成本与资源的平衡,那么它就将衰败并被下一个帝国周期所取代。当进一步扩张的建设成本开始相当于或超过边际收益时,扩张停止了,从而到了一种平衡。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随后,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国内外环境的发展就开始破坏这种平衡。因此,霸权成本使霸主国不得已放弃霸主地位,让位于新的崛起国。因此,霸权体系表现出周期性,不平衡发展规律继续重新分配权力,从而破坏上一次霸权争斗建立起来的现状。不平衡代替平衡,世界走向新一轮的霸权冲突^[13](第 115-210 页)。霸权周期论说明,国际自由经济的存在少不了要有一个霸主。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吉尔平认为,政治环境是国际自由经济秩序存在的条件,并指出霸主的兴衰是结构变革的重要决定因素。

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中进一步论述了霸权安全思想。吉尔平认为,霸权稳定论主张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大国是自由国际经济兴起的必要条件。自由国际经济需要一个能致力于自由经济原则的霸权国。吉尔平通过回击霸权稳定论的批评者,论证了霸权是国际和平与安全存在的必要条件,认为领导或霸权有助于国际合作。如果没有霸权,就没有一个领导国来执行世界经济顺利运转所必须的几项任务。吉尔平进一步指出,安全不仅指霸权国本身的安全,还包括盟国的安全。他强调“霸权稳定”、“经济大国合作”和“自由安全秩序”。他认为,使用希腊语中的“霸主”而不是“领导国”来说明领导国时常不得不动用权力来实现建立和管理自由世界经济的目标。霸主定义为联盟的领导国。霸主建立自由世界经济主要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和安全利益。我们认为霸主的安全利益中可能包括盟国的经济和军事利益^[14](第 100-109 页)。

传统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也认为,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整个国际社会是松散的,不稳定的,国家安全处于自助状态,国家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获得安全。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世界安全就是拥有一个强大霸权统治下的国际社会,只有建立霸权体系世界才是稳定和安全的。国际关系领域最大限度地获取权力的欲望是普遍存在的,追求权力的国家外表是追求均势,实际上是追求权力的优势(superiority of power),只有这样它们才有可能得到最大的安全系数^[5](第 210 页)。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倾向于霸权安全。他认为,大国行为有三种模式:畏惧(fear)、自助(self-help)和权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大国总在寻找机会攫取超出其对手的权力,直至获取霸权。国家极其关注权力如何在它们中得以分配,并尽力使自己占有世界权力最大化。因此,国家追求的是相对权力而不是绝对权力。最大量地占有相对权力的国家主要关心物质能力的分配。他们伺机牺牲潜在对手的利益为自己添加额外的权力,以此改变均势。米尔斯海默认为,对国际体系的日常生活而言,安全竞争是常有的。潜在霸主将致力于获得更多的权力,并最终赢得地区霸权,因为霸权是安全的最终形式。大国认识到,保证自己安全的最佳办法是当前就争取成为霸主,这样就消除了任何其他大国挑战的可能性^[8](第 42-49 页)。

四、地缘安全论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一词源自希腊语,Ge 或 Gaia 原意是地球之神,polis 指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意指地球和国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源于 19 世纪后期。20 世纪 70 年代新地缘政治学发端于美国和法国^[5](第 2 页),尤其与亨利·基辛格密不可分。他将地缘政治学引进有关外交政策的论述中。他认为,地理因素依然是影响国际安全的一个方面,尽管地理因素的限制已失去昔日

的辉煌^[13] (第146-147页)。在现实主义看来,控制关键的地缘战略位置是国家在国际政治中获取权力大小的一种手段。地缘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很大,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内陆国家和沿海国家就有不同的安全观。地缘因素是制订对外战略的出发点和影响国家安全的基本因素。古罗马学者西塞罗曾提出过“谁能控制海洋(地中海),谁就能控制世界”的思想。当时,一些国家为了争夺陆地在地中海地区进行过多次战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形成了现代地缘政治理论,其中以马汉为代表的“海权论”、以麦金德为代表的“陆权论”、以斯皮克曼为代表的“边缘地带论”、以科恩为代表的“地缘区域论”和以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棋盘论”最为典型。

美国的著名学者马汉强调海权是国家控制世界的关键因素,他认为谁是海洋的主人谁就是时局的主人^[15] (第129页)。海权体现在海上商业及海军在海洋和可航行水道上的军事行动^[16] (第277页)。马汉认为,1765年蒸汽机的发明使其成了海上蒸汽舰动力源。随着海上动力源的革命性变化,海权对于世界历史具有决定性影响。对具有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的控制是影响一个国家实力的至关重要因素,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地形、疆域、人口、民族性格和政治制度对国家的影响。另外,一个国家通过海洋进行国际贸易的能力,也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否成为大国的重要因素。他提出,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其力量如果足以控制公海,即控制被大陆分割的全球水域,就能控制世界的财富,从而统治世界。因此,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拥有控制世界的关键性权力的源泉,只有控制了海洋的国家才不易遭到别国入侵^[4] (第46页)。大英帝国的海洋主导是海权运用的辉煌范例。帝国兴衰的历史线索是:是否掌握对海洋的控制权。海权是通向世界权力的钥匙^[15] (第150页)。当己方的海军力量大大超过对方时,这样的大部队渡海运征,便能够或是全部或是部分获得安全保障^[17] (第195页)。

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提出了陆权论。1904年,麦金德在向皇家地理学会提交的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提出了陆权安全思想。他认为,海权国家处于优势地位的时代行将结束,而陆权即将回归。海权与陆权之间总是存在一种固定均势,因此,任何一方都无法获得对另一方的绝对优势地位。他们各自都有某种优势,藉此他们可以重建均势。他认为,铁路使陆地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提升,陆权则取代海权成为世界关键性权力的源泉。因此,谁能控制关键性陆地,谁就拥有控制世界的权力。麦金德认为,随着横贯大陆的铁路铺设改变了陆上强国的状况,铁路使欧亚成为世界地缘的心脏地带。1919年,麦金德在《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心脏地带论”。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带具备了成为世界权力的根本中心的潜力。而东欧是夺取世界权力的关键。谁统治了东欧,谁就主宰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主宰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主宰了全世界。

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是在“海权论”和“陆权论”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斯皮克曼认为,只要控制住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就可以限制大陆心脏地带的陆权国家的扩张。他提出,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在斯皮克曼地缘观点中,有三个主要的力量中心:海上世界、陆地世界和边缘地带。斯皮克曼还建议美日应在边缘地带内建立一种均势,并力求限制边缘地带国家所拥有的权力。

美国另一地缘政治学家柯恩则提出了不同于斯皮克曼的见解,他提出了地缘政治特征是区域建构的思想。他在1964年发表的《分裂世界的地理与政治》一书中提出,世界性权力中心的第一级地缘战略区有两个,即以美国为核心的海权世界和以苏联为核心的欧亚大陆世界,其中次一级的是海洋西欧和大陆中国。在两大“地缘战略”区域组成的全球框架内,新的“地缘政治”区域正在显现。他们是北美、西欧、苏联和中国。全球两极框架内的“多重权力叉点”正在显露^[15] (第30-176页)。

当今美国著名地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提出了“棋盘论”。他认为,政治地理仍是影响国际事务的关键因素。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已成为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凭借其决定性力量可建立起由美国设计的全球体系,而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是全球意义的地缘战略区域。布热津斯基在《大棋盘》一书中,把主要国家分为“地缘战略棋手”和“支轴国家”两类。布热津斯基认为,欧亚是个棋盘。棋盘的西部、东部、中部和南部有数个实力不等的重要棋手。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

度是主要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英国、日本和印尼不具备棋手的资格,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和伊朗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地缘政治支轴国。今天,地缘政治问题已不再是欧亚哪个地理部分是控制整个大陆的出发点,或陆地力量是否比海洋力量更重要。随着控制整个欧亚大陆成为取得全球性主导地位的主要基础,地缘政治已从地区问题扩大到全球范围^[18](第 43-55 页)。根据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思想,我们不难理解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着眼点,一是争夺和控制欧亚边缘地带,二是“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 and 敌对的欧亚大陆大国的出现”。

五、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安全理论的批判

现实主义在西方国际安全研究中一直占据主导性地位,这一状况至今仍无法改变。虽然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现实主义安全理论进行了批判,但在西方国际安全研究中,现实主义的地位仍无法撼动。现实主义对国际安全研究的意义是有目共睹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对安全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权力与安全的关系。在一个没有秩序的国际社会中,权力较大的行为体将对国际局势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在现实主义看来,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权力越大,其国家就越安全。新现实主义的贡献主要是提出了国际结构与国际安全的关系,认为是结构而不是构成结构的单元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更大。现实主义的国际安全理论对国家间军事对抗做出了较好的解释。安全困境理论较好地解释了 20 世纪两次大战和冷战对抗。现实主义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该理论把安全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将安全概念局限于军事层面,使其难以解释因经济全球化发展而出现的国际相互依存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安全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也制约着国家使用军事手段解决矛盾和分歧。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数字化时代,国际贸易和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国际分工,也带动了资本、人才和资源的跨国流动,世界一体化趋势加强,国际安全因素也出现了由纯军事领域向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环境等综合领域扩散的趋势。20 世纪 90 年代起,国际安全已表现出一种综合性的相互安全,即个人、群体(包括国家)、国际社会之间的相互安全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环境等领域的相互安全。国际安全开始出现两大变化,即安全内涵从军事安全转向包括军事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安全研究主体从国家单一主体转向包括国家在内的多元主体。现实主义安全论由于将安全限制在军事层面和国家层面,其结论必然是国际冲突直至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表明,战争的代价和破坏性空前巨大。如果冷战结束以后的今天再通过体系战争的形式实现国际权力转移,说明世界大国丝毫没有从两次大战中汲取经验教训,况且核时代的核战争将以参与战争的国家同归于尽告终,这使得国家将成为非理性国家。这种非理性结果显然是不符合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理性的假设也不符合理性国家的初始动机。

面对新型的大国关系结构和国际安全形势,现实主义的安全理论出现了贫困。冷战后大国合作势头有所加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大国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技术扩散等国际安全问题上的合作趋势将不断加强。同时,国家安全之间的联动性和相互依赖性也使一些非军事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大国需要合作来解决。“在每一轮国际政治周期或周期中的某个阶段结束之后,大国合作与融合都出现一次比一次加强的趋势,尤其是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世界市场的逐步统一,更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跳跃式发展而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强劲势头。”^[19](第 27 页)因此,大国间发生战争将损害国际相互依存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大国不以战争形式而以和平过渡形式实现新旧国际权力结构的转换是完全可能的。从冷战结束至今国际政治的实践来看,由美苏两极争霸到美国单极独霸并非由霸权战争完成,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转变不是以战争更替形式实现的。这预示着国际权力转移并不必然通过体系战争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大国之间并不必然爆发体系战争。现实主义安全研究由于过于注重国家间安全政治而忽视了国内政治与国际安全的关系,因此,现实主义安全研究也无法解释冷战的结束以及冷战后所发生的许多重大国际安全事件,如“9·11 事件”。由于现实主义安全理论主要研究军事安全和国家安全,而忽视了其它安全现象,从而暴露了其理论的短视。在非国家安全和非军事安全

等问题上,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似乎更具有生命力。因此,只有从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角度才有可能真正地理解并分析这个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

[参 考 文 献]

- [1] 彼得·J·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M].李小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 [2] Baldwin, David A.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J]. World Politics, 1995, (10).
- [3] Walt, Stephen M. The Renaissance Security[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1, 35.
- [4] 克雷格·斯奈德,等.当代安全与战略[M].徐伟地,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 [5]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1.
- [6] Carr, Edward H.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4.
- [7] 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胡少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 [8]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9] 罗伯特·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10]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顾淑馨,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 [11]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 [12]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 1500-1990[M].高祖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13]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14]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M].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15] 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M].刘从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 [16] 马汉著.海权论[M].萧伟中,等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
- [17] 艾·塞·马汉.海军战略[M].蔡鸿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 [18]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19] 郭学堂.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性中的新问题和新思路[J].战略与管理,1997, (1).

(责任编辑 叶娟丽)

On Western Realist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LIU Shengx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Law, Wuhan 430060,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U Shengxiang (1962-),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Law,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Abstract: Realism is used the most widely in security study. There is a tradition of realism. In the western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alism is in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end of 1990s realism is a dominant theory in western security study. New-realism made realism a new stage. Realist theory continued to be a dominant position. New-realism gave rise to a theoretical deb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study of security. In concrete speaking the western realist theory of security includes security theory of balance of power, security theory of hegemony and security theory of geopolitics.

Key words: the We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